

# 从《安徽丛书》到《安徽古籍丛书》

赵敏 牛继清<sup>1</sup>

(淮北师范大学 安徽文献整理与研究中心, 安徽 淮北 235000)

**【摘要】**：清末至民初，我国古典学术进入了全面总结与向近代转型的关键时期，安徽知识分子也致力于安徽地方文献的搜罗、整理、研究。1931年“《安徽丛书》编印处、编审会”成立，至1936年，《安徽丛书》共出版六期，产生了很大的学术影响，引起了学界的高度关注。新中国成立后，省内外学者继续安徽文献的搜集、整理和研究，1988年底，开始编纂《安徽古籍丛书》，迄今已持续近30年，整理出版了100余种地方文献，对安徽区域文化研究与建设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，成为新时期我国古籍整理出版的典范。

**【关键词】**：《安徽丛书》 《安徽古籍丛书》

**【中图分类号】**：G127 **【文献标志码】**：A **【文章编号】**：1008-3634(2019)01-0124-09

## 一、《安徽丛书》<sup>(1)</sup>纂修缘起

### (1) 保存国粹运动

清末民初，我国古典学术进入了全面总结与向近代转型的关键时期，“存古学堂”的普遍设立，“国粹”学派的兴起，都是这一时代特征的突出体现。“国粹”一词最早于19世纪80年代出现于日本，指日本的民族精髓<sup>[1]</sup>，随后为旅日留日中国学者接受。1898年，旅居横滨的梁启超办《清议报》，所拟四宗旨之一便是“发明东亚学术，以保存亚粹”<sup>[2]</sup>。到1902年，梁氏又计划创办《国学报》，写信给曾任清朝驻日参赞的黄遵宪，提出“养成国民，当以保存国粹为主义，当取旧学磨洗而光大之”<sup>[3]</sup>，明确将“亚粹”改为“国粹”。此后，这一概念被引入国内。1902-1904年间，梁启超、黄节(1873-1935)等人陆续在报刊撰文，倡“祖国国粹”。“国粹”一词，内涵自是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，所以为许多先进知识分子所认同，“国学保存会”、《国粹学报》相继创办，流风甚炽，以至为清廷大吏及清政府所接受，领一时学术文化新潮流。

1903年，由清政府颁布的《学务政纲》中有：“外国学堂最重保存国粹，此(习国文，读经书)即保存国粹之一大端。”<sup>[4]</sup><sup>[204]</sup>1907年，晚清重臣、清流领袖、湖广总督张之洞改湖北经心书院为存古学堂，目的即在“保存国粹”，次年江苏等省仿行，1911年得到清政府首肯，在各地推广。不过，清廷之主“国粹”，另有其目的。张之洞在书院改制后，曾上了著名的《创立存古学堂折》(又名《保存国粹疏》)，强调：“存古学堂，重在保存国粹，且养成传习中学之师。”“历次兴学谕旨，惟以端正趋向为教育之源，一则曰敦崇正学，造就通才；再则曰庠序学校，皆以明伦。圣训煌煌，无非以崇正黜邪为宗，以喜新忘本为戒。……乃近来学堂新进之士，蔑先正而喜新奇，急功利而忘道谊。……为国家计，则必有乱臣贼子之祸；为世道计，则不啻有洪水猛兽之忧。此微臣区区保存国粹之苦心，或于世教不无裨益。”<sup>[5]</sup>说明“保存国粹”只是手段，而维护清王朝的腐朽统治才是首要目的。

在这样的潮流影响下，一批封疆大吏纷纷以保存国粹为名，奏设图书馆。1906年至1911年间，湖南巡抚庞鸿书、奉天总督徐世昌、两江总督端方、山东巡抚袁树勋、山西巡抚宝芬、浙江巡抚增韞、广西巡抚张鸣岐等都有类似奏折，1907年，安徽巡抚冯

<sup>1</sup>作者简介：赵敏(1977-)，女，江苏邳州人，讲师，硕士；牛继清(1965-)，男，甘肃通渭人，教授。

煦也有《采访皖省遗书以存国粹折》，提出了搜集、保存安徽先贤著作的倡议。

冯煦(1842-1927年)，字梦华，号蒿庵，江苏金坛人。光绪十二年(1886)一甲三名进士，授翰林院编修，充湖南乡试主考官。1895年，出为安徽凤阳知府，历山西、四川按察使，1905年，迁安徽布政使兼提学使，翌年5月擢升安徽巡抚。冯氏向学，有“江南通儒”之称，为官尤重地方文教事业的发展，存文献，修方志，兴学校。十年翰林院生涯，加上前后两次在安徽任职，让冯煦对安徽文献了解极深。他在奏折中特别强调了清代安徽学术文化的繁盛：

皖省襟江带淮，包络潜、霍，夙为人文渊藪。国朝右文，皖才尤盛，性理若宣城施闰章，婺源汪绂；考据若婺源江永，休宁戴震，歙金榜、凌廷堪，绩溪胡培翬，歙俞正燮，当涂徐文靖；词章若桐城方苞、姚鼐，泾朱珔、包世臣；算术若宣城梅文鼎暨其孙穀成，歙汪莱，或综贯遗经，或阐明绝学。凡所述作，固已彪炳宙合，其他抱潜德而弗彰，守遗编以终老者，尤不乏人。以至金石之录，垂为世珍，诸史赖其折中，群经得其通假，是皆后学之津梁，治世之鸿秘也。

臣虽至愚，不敢不勉。当饬秘属，凡有关于政界学界诸书，及金石之已未著录者，先行汇集全编，旁求精拓。其孤行之本，手抄之书，则录其副本以上。其收藏之家，慨出所蓄，捐书至多部、彝器碑版至多种者，则举其名以闻……以备图书馆之用。唯皖者局于一隅，惧多遗佚，应请饬下各直省，一并甄采，庶几士林感奋，国粹常存，仰副朝廷兴学牖民之至意<sup>[6]</sup>。

冯氏是一位传统知识分子，在政治上属于保守主义，“保存国粹”的潮流正好给他提供了一个弘扬传统文化的机会。他的倡议引起了安徽知识分子的共鸣，不少藏书家准备积极献书，以共襄壮举。最著者如刘开之孙刘武谟，数十年节衣缩食，搜罗文献，欲刊刻印行传世，听闻冯氏有此计划，就前往安庆，将多年所藏遗书，倾篋而授。可惜的是第二年6月，冯煦因事解职，而此时革命者起义频发，立宪派请愿不断，而光绪、慈禧又接连谢世，清廷处于风雨飘摇之中，采访遗书整理文献之举也就不了了之。

## (2) 安徽图书馆与《学风》杂志

进入民国，安徽知识分子依然重视文化遗产，继续努力，1913年2月，终于在安庆建成了安徽省立图书馆。此后十余年间，虽然馆长屡经更迭，但多能致力于安徽地方志书的搜罗入藏。1928年，胡翼谋接任馆长，根据教育厅颁布的《安徽省图书馆规程》，设立了文献征存股，专门负责采访收集乡贤遗稿、文献整理与编印发行，安徽文献整理初步进入正轨。1930年，著名学者陈东原以教育厅督学身份担任图书馆长，整顿馆务，将文献征存股改为研究股，由自己兼任主任，并明确提出“阐发本省文献，是省立图书馆应有的责任之一”。因此，他先后修书给胡适，讨论“本省文献之征集”工作，胡适在复信中首先肯定陈氏的主张“是极好的事”，并提出了四个步骤：

第一，先征集志书；第二，制作地方文献存佚简表，以方便收集；第三，特别注意收集安庆、宁国、徽州三府学者的著述，宜从旧刻书藏书之家收集；第四，诗文集不可删，小说弹词也宜充分收集<sup>[2]</sup>。

陈东原充分参考了胡适的建议，致力于购买借存抄录安徽省、府、州、县志的工作，取得了突出成绩。并创办《学风》杂志，以之作为宣传安徽文化的窗口和研究安徽文献的平台。截至1937年6月停刊，《学风》共出版7卷67期，产生了较大的学术影响。吴保障、蒋元卿、姚永朴、光大中等都在《学风》上发表了系列安徽文献与皖籍著述家的文章，就中尤以吴保障《四库著录安徽先贤书目》、蒋元卿“各县著述人物考”系列等为著，掀起了研究安徽文献的第一个高潮。

## (3) 安徽通志馆的设立

1929年，安徽省府教育厅发布训令：“查民族性之遗留，典籍攸赖；地方文化之进展，史迹可凭。皖省介处南朔，民风敦朴，精研学术，代有闻人，名作遗编，所在多有。倘任其散失，殊失保存文献之旨。……征集与本省文化有关之出版物，所有各该县志书，乡贤遗著及民俗刊物等等，均在应行搜集之列，以资保存，而便研究。”<sup>[3]</sup>说明教育主管部门已经有了搜集、整理研究安徽文献的初

步设想。12月,国民政府发布了《修志事例概要》,规定“各省应于省会所在地设立省通志馆……报内政部备案”<sup>[7]205</sup>。此前,安徽最后一次纂修通志,是清光绪四年(1878年),至1930年已经50余年,接近清制60年一修的限期。于是在1930年8月召开的安徽省政府会议上,李应生等委员提议,应仿江浙两省开馆修志,最后形成决议,成立“安徽通志馆筹备处”,由江暉任筹备主任,后聘为馆长,并聘徐乃昌为总纂,金天翻、程演生、吴镜天等人为编纂。

江暉(1880-1951),字彤侯,歙县人。毕业于南京陆军学堂,在中国公学任教期间,加入同盟会。民国初年担任安徽省教育厅长、省政府委员,新的安徽通志馆成立后,成为第一任馆长。纂修地方志,搜集与保存乡邦文献本属题中应有之义。而江氏也特别重视文献的搜集与整理,用陈东原的话说,他“是极注重文献的人,将来通志馆对于阐发文献的事,一定可以用一大部分去做”<sup>(4)</sup>。从他主持制定的《安徽通志馆图书室规则》看,其中有“省府州县旧志及各县新志”、“关于修志之各种参考图书”、“安徽前贤著述”、“各地方寄赠之皖贤碑铭传状”、“安徽金石古物拓本”等<sup>[7]211</sup>,表明对地方文献的收集整理开始了。而《安徽通志例目》也特别强调:“文化者,天不能产,地不能茁,所以创之者人。人心之精者,其有声为文,其无声为诸美术艺事。安徽朴学高文,下至百工技艺,多可甄录,故以《艺文》《艺术》《金石》《古物》终。”<sup>[7]216</sup>而且,他还与省立图书馆联合搜辑安徽学者遗著,“殷殷以通力合作相嘱,是不啻阐发文献之前途。”<sup>(5)</sup>

安徽通志馆负有采访、征集、著录安徽地方文献的责任,直接催生了“《安徽丛书》编审会”的成立与《安徽丛书》的编纂出版。

## 二、《安徽丛书》的纂修及特点

1931年1月30日,“《安徽丛书》编印处”在上海成立,同时成立编审会。在叙述缘起时强调:

安徽年来困于天灾匪患,社会暗淡,然安徽人士,却努力文化事业,自强不息。如安徽大学之建设也,安徽通志之编纂也,东方文化学会之协进也。最近又共谋设立安徽丛书编印处,刊行安徽丛书<sup>(6)</sup>。

会议公推安徽通志馆馆长江暉为主任,徐乃昌、程演生、黄宾虹、程霖生、吴镜天五人为常务委员。

徐乃昌、黄宾虹两人任搜集、版本常务委员,徐氏并具体负责编印处。

徐乃昌(1868-1943),字积余,晚号随庵老人,南陵人。光绪十九年(1893)举人,历淮安知府、江南盐法道,光绪二十八年(1902)赴日本考察学务,归任提调江南中小学堂事务、总办江南高等学堂,督办三江师范学堂。入民国,总纂安徽通志稿。家富藏书,悉心编辑刊行丛书多种。

黄宾虹(1865-1955),初名懋质,后改质,字朴存,号宾虹,以号行,歙县人。近现代著名艺术家,诗、书、画、印及鉴赏皆精,尤长于山水。历任新华艺专、北平艺专、中央美院华东分院教授。

程演生任交际常务委员。程演生(1888-1955),字源铨,号天柱外史,怀宁人。肄业于安徽高等学堂,留学英、法、日等国,获法国考古研究院博士。回国后,先后在北京大学、暨南大学等校任教。1932年,程演生任安徽大学校长兼安徽通志馆副馆长。

程霖生任经济常务委员。程霖生(1886-1943),字龄孙,歙县人。上海著名民族资本家,歙县旅沪同乡会会长。酷好古铜器书画,藏古彝器150余件,编印《新安程氏收藏古金铜器影印册》等。此次,程氏资助一万元用于丛书编印。

吴镜天任文书常务委员。吴镜天(1880-1949),怀宁人。肄业于安徽高等学堂,历任中央大学教授,安徽大学教授、教务长,安徽通志馆特约编纂。

这样一种周全的人员配备与明确的职责分工,既考虑到了丛书编纂、出版、发行所涉及的方方面面,又完全发挥了各位常务委员的个人特长,可以说是天衣无缝,应该是经过精心筹备与充分讨论。同时,该编审会的主要成员与“安徽通志馆”的骨干力量高度重合,也能说明两个机构之间及两桩文化活动之间的内在关联。

其他委员尚有许世英(秋浦人,曾任安徽省省长、内阁总理)、张启后(泗县人,曾任安徽省府秘书长)、陈诗(庐江人,清季民国著名诗人)、洪汝闾(歙县人,清季民国著名词人)、李德膏(桐城人,曾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,创办安徽公学)、胡朴安(泾县人,民国著名学者、报人)、王揖唐(合肥人,曾任内务总长、国会议长、安徽省长等)、李国松(合肥人,李经羲之子。曾任安徽咨议局局长)、李国杰(合肥人,李经述之子。曾任轮船招商局董事会会长)、周达(至德人,周学海之子。创中国数学会,任中国科学社名誉社长),尽属皖省旅沪名流硕学,可以说是极一时之选。编审会还聘请上海亚东图书馆经理、著名出版家绩溪汪孟邹为办事员。

此外,编审会“聘本省及海内藏书家、校勘家为该会名誉会员,以资辅导”<sup>[7]</sup>,名誉会员共96人,列名其中的有朱孝臧、周叔迦、冒广生、胡适、徐森玉、马一浮、陈乃干、许承尧、张元济、傅增湘、黄节、罗振玉等著名学者。

编审会制订了编辑出版《安徽丛书》的9条方案:抽印《四库全书》及其他丛书所收皖人重要著述;搜集整理未经刊行的皖人重要著述;搜集曾遭禁毁的皖人重要著述;搜集整理外省学者论安徽学术的著作;搜集整理名宦流寓在安徽时所撰著作;皖人在外地著述出版论安徽渊源的著作;翻印有学术价值的皖人名著;重印一批学术价值较高但不易得到的孤本书;征集皖人的书画作品。

《安徽丛书》第一期于1932年影印发行,收入清芮曰松《禹贡今释》2卷、清汪龙《毛诗异义》4卷附《诗谱》1卷、清周廷霖《韩诗外传校注》10卷附《拾遗》1卷、清吴焯《五声反切正均》不分卷、清赵绍祖《通鉴注商》18卷、清赵继序《汉儒传记》2卷附《历朝崇经记》1卷、明程瞳《新安学系录》16卷、明释弘仁《画偈》1卷附《江注诗集》4卷,共8种附4种。并有各书提要、著者小传<sup>[8]</sup>。

到1936年为止,《安徽丛书》先后出版了6期,连同附录共计30种360多卷。第2期为程瑶田专辑;第3期收黄生、江永、俞正燮著作;第4期为凌廷堪专辑;第5期为黄山志图专辑;第6期为戴震专辑。就中可特别注意者为以下几点:

其一,第1期属于初创,搜罗未广,遂以徐乃昌私家藏图书为主,内容涉及经、史、子、集四部。《画偈》一书为释弘仁(浙江大师)题画诗,其圆寂后方由好友许楚辑成,未曾刊行,汪律本、黄宾虹等四处搜罗,仅得20余首,遂疑已佚。后来,许承尧从歙县毕恩桂处获江蓉手抄本《画偈》75首,恰逢有《安徽丛书》之议,许氏乃抄录一份,寄给黄宾虹,连同弘仁从子江注的诗集一道收入印行,而《江注诗集》此前也仅以手抄本存世。又程瑶田《果羸转语记》,迄无刻印本,尹石公得之北平,卷末有王念孙跋,遂寄与程演生,程付洪汝闾校后收入第2期程瑶田专辑付印。此后,第3期中所收俞正燮《癸巳类稿》,“几改原刻三分之一,向未流传。兹由该处借得于黟县藏书家,照俞先生手稿付印,以存真迹”<sup>[9]</sup>。可以看出丛书编印者对于搜集、抢救珍稀安徽地方文献的高度重视和积极努力。

其二,编印处成立时,就宣称:“安徽之经学、小学、算学、文学、理学、艺术,在历史上皆占有重要之位置。将来丛书刊行,必大有贡献于学术界,是可逆睹。”<sup>[12]</sup>除程瑶田、凌廷堪、戴震三人的专辑外,第3期收黄生《字诂》1卷、《义府》2卷,江永《古韵标准》4卷、《诗韵举例》1卷、《四声切韵表》1卷、《音学辨微》1卷,俞正燮《癸巳类稿》10卷,主要为经学、小学著述,体现出丛书编印者对于清代皖派朴学成就的肯定与崇敬,也与当时的学术风气相符合。

其三,《安徽丛书》虽然是影印出版,但在版本搜集选择上下了很大工夫,所辑多为稿本、抄本、精校本、稀见本,也做了一定的校勘整理工作,属于集搜集、整理与出版为一体的文化行为。如第2期收入了吴承仕所辑程瑶田《仪礼经注疑直》5卷,而《果羸转语记》后附有洪汝闾的“校记”。第3期江永《四声切韵表》后附胡朴安《校刊记》1卷;俞正燮《癸巳类稿》后,附有王立中所撰《俞理初先生年谱》1卷,并有蔡元培先生跋表彰俞氏,谓:“余自十余岁时得俞先生之《癸巳类稿》及《存稿》,而深好

之,历五十年而好之如故……余之崇拜俞先生,有最重要者二点……一、认识人权,男女皆人也……二、认识时代,人类之推理与想象,无不随时代而进步。……”<sup>[8]</sup>第七卷 571 数年后蔡先生仍强调此点,“作一长跋,注重两点:一为时代标准,一为男女平权”<sup>[8]</sup>第十四卷 371。而第 5 期则附程演生《黄山志定本校记》、《黄山志续集校记》各 1 卷。第 6 期戴震《经考》后附罗更《校记》1 卷,《戴东原集》后附胡朴安《戴先生所著书考》1 卷。

其四,丛书第 5 期为黄山志、图专辑,收入宋无名氏《黄山图经》1 卷汪晋谷《图》1 卷、清闵麟嗣《黄山志定本》8 卷萧晨《图》1 卷、清汪士鋐等《黄山志续集》8 卷僧传悟《图》1 卷,附程演生《黄山志定本校记》1 卷、《黄山志续集校记》1 卷。《申报》刊出的预告:“闻该处以最近该省黄山开发为风景区,中外游客纷集,而对于黄山景物、名境、史概及前贤文献,欲有述作,则殊感茫然。往往以重金购旧志,犹不能得,书贾每收一种,即居为奇货。至新辑零星刊物,又多漏略鄙俚,不足供大雅浏览。因特选辑黄山最完备精核之图志三种……”说明此期《安徽丛书》的编印就是为了适应黄山被开辟为风景区后的现实需求,是典型的经世之举,也充分说明丛书编印者在弘扬传统学术文化的同时,对家乡的社会经济发展给予了最密切的关注。

### 三、《安徽丛书》的营销与影响

《安徽丛书》的影印出版是一次商业性的地方文献整理活动,徐乃昌、汪孟邹等人又长期从事图书出版事业,轻车熟路,因此在营销宣传方面做足了功夫。从编印处成立,到每一期的出版预告、出版消息及所收书目,都在上海《申报》上刊登广告。同时,还在天津《大公报》、《益世报》、安徽图书馆《学风》杂志、浙江图书馆《浙江省立图书馆月刊》等报刊登载消息进行宣传,使其影响范围有更大扩展。此外,前三期出版后,编纂处都在《学风》杂志刊登“全书提要”,第 1 期由黄宾虹、程演生所撰<sup>[10]</sup>,第 2 期是胡朴安所撰,第 3 期署“编审会”。

编纂处在刊发预告、书讯时,都会附有全书定价、邮寄及挂号费用,发行处与代售处等信息。如在《学风》杂志刊出的“介绍安徽丛书第一期全书”,除了叙述编印原委、书目作者版本,特别注明:“定价及寄费:本书每部定价大洋十六元,寄售每部加邮费连挂号大洋四角二分。发行处及代售处:总发行处设于上海法租界福煦路五百三十七号,发行处设于上海五马路亚东图书馆等处。安庆、芜湖、北平、杭州、天津各地大书店亦皆代售。”《申报》则具体说明代售处有上海亚东图书馆、中国书店、蟬隐庐、来青阁、富晋书社、商务印书馆、中华书局,芜湖科学图书社,北京琉璃厂富晋书社,杭州抱经堂等。后来,代售城市扩展到南京、武昌等,而包括安徽省立图书馆、安徽通志馆、安徽教育经费管理处在内的不少图书收藏、教育管理机构也成为《安徽丛书》的代售处。安庆、芜湖为安徽省内沿江商埠,亦为文化发达城市,上海、北平、杭州、天津、南京、武昌等更是当时国内经济、文化一线城市。此外,《安徽丛书》还采取公布印数、对外预约销售<sup>[11]</sup>、限期特价等营销方式进行促销。

《安徽丛书》在编印之初,就产生了较大的学术影响和社会反应,引起了学界的高度关注,不少学者关心、询问各期拟收文献的情况,甚至热情推荐待选珍贵文献。1931 年 2 月,编纂处成立未久,徐乃昌就曾接到任心白的信,转述霍丘人王潜刚“对于编印《安徽丛书》的意见……尤冀于阐幽抉微,多加注意,庶使怀瑾握瑜,捏没不彰者,悉得一一表扬,功德宏伟不在大禹下矣”<sup>[12]</sup>。同年,上海学者姚光致信徐乃昌,云:“贵省将编印先哲遗书,发扬文化,于国有光,甚盛!甚盛!辱承约为会员,引在赞襄之列,深愧谫陋,无能为役耳。会中印行书籍第一期若干种,其目录已行审订否?乞以见教。”<sup>[9]</sup>而徐乃昌曾寄王文进一函:

搢青先生台鉴。接奉大函,并《毛郑异同考》一书,首尾二册均已收到。当即将函书并交《安徽丛书》编印会审查,金谓第一期内已印有《毛诗》一类书籍,目下尚无印行之意。程演生先生并谓“尊处去岁曾有函托”云云。兹特将原书二册由邮寄还,即希眷收赐覆。效力不周,务乞鉴原是幸。敬请大安。徐乃昌敬启。三月十一日<sup>[10]</sup>。

王文进(1893-1960),河北任邱人,为北京琉璃厂书肆文禄堂主人,笃学好古,与民国学者多有往还。从此复函来看,王氏曾先后函请程演生与徐乃昌,建议将《毛郑异同考》收入《安徽丛书》影印出版,并寄上原书。今按:《毛郑异同考》十卷,为安徽歙县学者程晋芳(1718-1784)撰著,迄未刊刻,仅有稿本与钞本流传。王氏所得当为清钞本<sup>[13]</sup>,以其珍稀难得,故函寄程、徐,建议收入丛书影印,惜未能如愿。

甚至有人将著作是否入选《安徽丛书》视作评价学者学术成就与影响的标准。伦明在《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》“朱师辙”条末云：“前岁皖人刊《安徽丛书》而不及君家，盖丰芑先生（朱骏声）寄籍元和，仲裁先生（朱师辙）又寄籍常州故也。”<sup>[11]</sup>言语之间，颇有为之惋惜之意。

丛书出版后，销售情况很好，不少著名学者都购买并利用它们进行研究工作。胡适先生作为安徽乡贤，对《安徽丛书》自然多所留意，并对二程氏族来源做了简单考证。《胡适日记》1934年1月25日记：

翻看《安徽丛书》中的明正德间程瞳所编的《新安学系录》。此书所收材料多用原有的墓志传状，翻看甚便。此书以二程子开宗。程瞳注《明道行状》云：据欧阳公所作翼国公墓志，中山博野之程氏出于新安程灵洗<sup>[12]</sup>。

鲁迅先生也购买了《安徽丛书》，其1934年10月4日日记：

下午，广平为从蟪隐庐买《安徽丛书》三集一部二函十八本，价十元<sup>[13]</sup><sup>173</sup>。

稍后，先生所著《病后杂谈之余》即引用了其中的材料：

又是一个偶然：昨天在《安徽丛书》第三集中看见了清俞正燮（1775-1840）《癸巳类稿》的改定本，那《除乐户丐户籍及女乐考附古事》里，却引有永乐皇帝的上谕，是根据王世贞《弇州史料》中的《南京法司所记》的，虽然不多，又未必是精粹，但也足够“略见一斑”，和献忠流贼的作品相比较了。

……但俞正燮的歌颂清朝功德，却不能不说是当然的事。他生于乾隆四十年，到他壮年以至晚年的时候，文字狱的血迹早已消失，满洲人的凶焰已经缓和，愚民政策早已集了大成，剩下的就只有“功德”了<sup>[14]</sup>。

而《安徽丛书》的巨大影响，也促使其他省域的学者开始考虑编印本省文献丛书。据王利器先生回忆，1947年，他随胡适去给傅增湘拜年，傅对胡说：“你们安徽省正印出《安徽丛书》，我也想编套《四川丛书》，重点放在宋代……”<sup>[15]</sup>

除了六期《安徽丛书》外，编印处还辑选了《安徽清代名家词》12种21卷，收录清代皖籍词人11家词别集12种，反响亦大。

第6期出版后，由于日本侵华活动日益剧烈，上海局势不稳，《安徽丛书》编纂这一重要的乡邦文献整理刊布活动乃告中止，盛业未竟，殊为可叹。

#### 四、《安徽古籍丛书》的编纂与影响

新中国成立后，安徽文献的搜集、整理和研究仍然持续，省内外学者都曾付出了艰辛努力。吴则虞先生（1913-1977）于1958年，撰《皖人书录》，揭出“安徽先辈的著作”，其选择标准为：

- 一、有关安徽历史——尤其是近代史；
- 二、有关学术、工艺、美术等记载；
- 三、方志、族谱、碑传；
- 四、罕见本、善本、稿本、批校本之皖人著述和皖人所刻书<sup>[16]</sup>。

文稿分四次在《安徽史学通讯》连载,披露了《张祖翼记张文祥刺马案》、《癸巳类稿》、《癸巳存稿》、《安吴四种》、《徐乃昌日记》等稿本;《方密之诗抄》、《复社姓氏目录》、《浙西村舍日记》等抄本;尚有个别批校本、方志与族谱。1959年,《安徽史学通讯》与《安徽历史学报》合并,更名为《安徽史学》。可能是因为即将失去发表的阵地,所以在《皖人书录(四)》“朱兰坡《古文汇抄》”后将朱琦此书所附“安徽作者姓名小传”全数录入(共计94人),“里面有许多作者和文集,在其他书里是不容易找到的”,“算得是一个索引”<sup>[17]</sup>。

1960年代初,安徽省图书馆编成《安徽文献书目》,著录本馆及安徽省博物馆、安庆市图书馆、桐城市图书馆、歙县图书馆等藏书单位收藏的安徽文献近4000种,涉及著者1700余人。此后,在安徽从事图书文献工作大半生的蒋元卿先生(1905-1999)历40余年完成的《皖人书录》一书出版,收入历代作者6600余人,著述17000余种,是迄今为止著录皖人著述最完备的目录著作。

1981年9月17日,中共中央发出《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》,国务院决定恢复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,制定了1982年至1990年《古籍整理出版九年规划》,我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出现了新局面,安徽文献整理出版适时重新起步。

1984年,黄山书社与安徽省古籍整理出版领导小组相继成立。1987年11月,省古籍领导小组邀请省内相关专家,在合肥召开了安徽省古籍整理会议,“实际重点是讨论编辑《安徽丛书》”。在这次会议上,实际负责安徽省古籍整理工作的吴孟复先生(1919-1995)做了主旨发言,他说:“关于《安徽丛书》,我本意先印旧《安徽丛书》,后再加编一点。后安师大说新编一套丛书,过后,我也同意。我觉得难弄出一个书目,本次会议要弄出来。”在和石云孙谈话时,吴先生又由《安徽丛书》讲到编纂续书,“以清代典籍新注疏为主,再收朱子等书,约40种。”<sup>[18]</sup>可见当时主要是想在重印民国编《安徽丛书》的基础上再编纂续书,充分体现出两个时代、两件安徽文献整理出版盛事间的内在关联。所以,1989年李一氓《对当前古籍整理的一些想法》中也说:“现在开始有一个好现象,安徽要编印新的《安徽丛书》。”<sup>[19]</sup>

1988年底,安徽省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委员会经过充分讨论,决定在今后一段时期,全省古籍出版工作的主体任务是编纂《安徽古籍丛书》,由编审会组织学者整理,黄山书社负责出版发行,新的丛书名称与计划正式确定<sup>[14]</sup>。同时组成了由吴孟复担任主任委员的15人编审委员会。

《安徽古籍丛书》初步拟目计320种,其中经部38种,史部75种,子部60种,集部147种,预计20年出齐。丛书的选录标准为:

第一,学术价值较高与在历史上影响较大者;

第二,稿本或刊本之稀见者;

第三,整理上有独到之处者;

第四,有关地方历史、地理资料之较切实,有助普及者;

第五,所录以文史哲为主,科技艺术另编各种专辑;

第六,若干重要作家之著作,汇为全集,亦列为该丛书之一种,初拟有戴震全集、俞正燮全集、包世臣全集等<sup>[20]70</sup>。

适应新时代的形势与需求,《安徽古籍丛书》在整理出版形式上也做了重大改变。为便于阅读,全部进行校勘、标点;难懂的古籍益以注释,个别具有较大普及意义的则附以今译;整理中尽量吸收国内外研究的新成果;佚文(含断句)应尽量搜集,作为附录;前人序跋和其他有关资料(传记、简谱、著作录、考证等),亦可作为附录;书前应由整理者撰写前言或点校说明<sup>[15]</sup>。

从书编纂出版工作比较顺利,到1991年5月已经出版14种,包括《定本庄子故》、《包拯集编年校补》、《方望溪遗集》、《小倦游阁集》、《桐城耆旧传》、《文学研究法》、《桐城文学渊源考·撰述考》、《疑庵诗》等,获得了较大的学术反响。著名学者张舜徽先生见到后,致信黄山书社:“近从书店买得姚永朴《旧闻随笔》一册,印刷、校注均佳,知贵社意在表扬乡先正遗书,甚盛!甚盛!”<sup>[20]</sup>台湾师范大学谢鸿轩教授来信:“故乡编印丛书,至为盛事。网罗放佚,校勘精严,尤为佩服。”<sup>[16]</sup>

截至2016年,《安徽古籍丛书》已经出版100余种,博涉四部,其中不乏《施愚山集》、《戴震全书》、《程瑶田全集》、《吴汝纶全集》、《凌廷堪全集》、《黄生全集》甚至《朱子全书》、《龙眠风雅全编》这样的大书,又列入附辑3种(《弢翁藏书年谱》、《明实录安徽经济史料类编》、《姚莹年谱》)、特辑2种(《刘文典全集》、《刘文典全集补编》),基本包括了历代皖籍重要著述家。有近80种已出、未出书目入选国家古籍整理重点项目,30余种(次)先后获得国家图书奖、全国优秀古籍图书奖、华东地区优秀古籍图书奖、安徽图书奖等奖项,丛书的整理编校出版质量与学术文化影响可略见一斑。

《安徽古籍丛书》整理出版持续近30年,为相关领域的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资料方便,对安徽区域文化研究与建设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,同时也是宣传、推介安徽优秀传统文化的形象大使,学术价值与社会效益俱佳,成为新时期我国古籍整理出版的典范。

一个世纪,几代学者,筚路蓝缕,薪火相传,这一文化志业终于绽出了绚丽的学术之华。

## 五、余论

根据最新调查,安徽历代文献总量约为33000余种,涉及13000余名学者、文人,其中约有5700余名著者的近17000种,以各种不同的传本(稿本、刻本、钞本、辑佚本)形式存留到了现在,以《中国古籍总目》统计的中国古籍约20万种而论,安徽文献占到了全国总量的85%,比重相当大,安徽为文化大省、文献大省,自非虚言。

现存安徽文献中,善本数量众多,许多都被收入《国家珍贵古籍名录》之中,还有不少稿本、钞本、批校本等。仅举稿本为例,据不完全统计,现存350多人近900种,包括朱熹、方以智、江永、戴震、程瑶田、汪中、凌廷堪、洪亮吉、朱为弼、程恩泽、夏燮、方宗诚、俞正燮、汪宗沂、萧穆、吴汝纶、马其昶等著名学者;汪道昆、程嘉燧、施闰章、方苞、姚鼐等著名文学家;张英、汪志伊、洪钧、潘世恩、李瀚章、李鸿章、刘铭传、丁汝昌、聂士成、周馥、徐乃昌等著名政治家;汪砢玉、汪关、邓石如、汪启淑、梁巘、包世臣等艺术名家;鲍廷博、汪启淑等著名藏书家,但对这些珍贵文献的整理、利用尚不充分,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安徽学术文化研究的深度与广度。

二十一世纪以来,地方文献的集录、影印出版、整理、研究、利用为国内学术界与出版界共同高度重视,且有重大进展。如山东省之“山东文献集成”、湖南省之“湖湘文库”、浙江省之“浙江文献集成”、河南省之“中州文献丛书”等等,都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与学术促进作用。比较而言,安徽文献集录出版的步伐已经严重滞后,所以,编辑影印出版《安徽文献集成》,是一项迫在眉睫的文化工程。安徽文献整理与研究事业,方兴未艾,大有可为。

### 参考文献:

[1] 马丁·伯纳尔. 刘师培与国粹运动[M]//中国近代思想人物论·保守主义. 台北:台北时报出版公司,1985:94.

[2] 梁启超. 清议报叙例[M]//梁启超全集:第1册. 北京:北京出版社,1999:168.

[3] 黄遵宪. 黄遵宪全集[M]. 北京:中华书局,2005:433.

- 
- [4]舒新城.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[M]. 北京:人民教育出版社, 1980:204.
- [5]张之洞. 创立存古学堂折[M]//潘懋元, 刘海峰.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·高等教育. 上海:上海教育出版社, 1993:233.
- [6]冯煦. 采访皖省遗书以存国粹折·蒿庵奏稿[M]//清代诗文集汇编. 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10:卷二.
- [7]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. 安徽通志馆第一次报告书[M]//民国文献类编·历史地理卷 941. 北京:国家图书馆出版社, 2015.
- [8]蔡元培. 蔡元培全集[M]. 杭州:浙江教育出版社, 1998.
- [9]姚昆群. 昆田, 昆遗. 姚光全集·书牍偶存[M]. 北京: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, 2007:334.
- [10]康冬梅. 徐乃昌致王文进手札十通辑释[J]. 晋图学刊, 2017(4):57-60.
- [11]伦明. 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[M]. 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 1999:57.
- [12]胡适. 胡适全集:第32卷[M]. 季羨林, 主编. 合肥:安徽教育出版社, 2003:280.
- [13]鲁迅. 鲁迅全集:第15卷[M]. 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 1981:173.
- [14]鲁迅. 病后杂谈之余——关于“舒愤懣”[M]//且介亭杂文. 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 1973:147-149.
- [15]王利器. 往日心痕——王利器自述[M]. 太原:山西人民出版社, 1997:78.
- [16]则虞. 皖人书录[J]. 安徽史学通讯, 1958(2):15.
- [17]则虞. 皖人书录:四[J]. 安徽史学通讯, 1958(6):42-50.
- [18]石云孙. 追忆吴孟复教授与《续经籍纂诂》[M]//训诂得义论:附录. 合肥:安徽教育出版社, 2006:477.
- [19]李一氓. 对当前古籍整理的一些看法[M]//古籍整理与出版专家论古籍整理与出版. 南京:凤凰出版社, 2008:87.
- [20]沙宗复. 《安徽古籍丛书》评介[J]. 出版工作, 1990(6):69-70.

#### 注释:

1 关于《安徽丛书》的介绍与研究,主要有徐学林《安徽丛书编审会与〈安徽丛书〉》(《徽州出版史叙论》,安徽美术出版社1995年)及《试论清末至民国前期的安徽出版业的历史地位(四)》(《出版发行研究》1999年第6期)、李弘毅《〈徐乃昌日记〉考论〈安徽丛书〉编纂特色》(《明清安徽典籍研究》,黄山书社2005年)、陈貽隆《胡适〈复陈东原书〉与民国安徽文献之整理》(《黑河学刊》2017年第4期)等。关于《安徽古籍丛书》的介绍,主要有沙宗复《〈安徽古籍丛书〉评介》(《出版工作》1990年6月)、诸伟奇《算事业,须由人做——〈安徽古籍丛书〉陆续出版》(《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》总第243期)等。

- 
- 2 参见胡适《整理安徽文献之我见——复陈馆长东原书》，《学风》1914年第1卷第1期。
- 3 参见《安徽教育行政周刊》，1929年第37期《令飭搜集本省文献》。
- 4 参见陈东原、胡适《〈整理安徽文献之我见——复陈馆长东原书〉跋》，《学风》1914年第1卷第1期。
- 5 参见法三《本馆搜藏地方志之报告》，《学风》1930年第1期。
- 6 参见《安徽丛书编印处成立》，《申报》1931年4月2日。
- 7 参见《安徽丛书编印处成立》，《申报》1931年4月2日。
- 8 参见《〈安徽丛书〉第一期全书印齐发行》，《申报》1932年8月9日。
- 9 参见《〈安徽丛书〉第三期将出版》，《申报》1934年3月30日。
- 10 第1期原提要在《学风》第3卷第6期发表时，署“胡朴安”，经程演生函告，于第3卷第7期登载“更正说明”，予以更正。
- 11 徐乃昌：《徐乃昌日记》辛未年(1931)记：“至中国书店托代售《安徽丛书》预约券。”西南大学图书馆藏稿本。转引自张敏慧：《徐乃昌刻书文化研究》第28页，安徽人民出版社2006年。
- 12 转引自张敏慧：《徐乃昌刻书文化研究》第28页，安徽人民出版社2006年。
- 13 程晋芳《毛郑异同考》现存清稿本(台湾“国立中央研究院”傅斯年图书馆藏)、清高翻抄本(浙江图书馆藏)、清抄本(伦明校改，国家图书馆藏)、清末传抄稿本(复旦大学图书馆藏)、清抄本(北京大学图书馆藏)诸本，其中北大图书馆藏清抄本为王氏旧藏，缘其晚年经陈梦家介绍，将所藏善本转售北大图书馆。
- 14 参见诸伟奇：《算事业，须由人做——〈安徽古籍丛书〉陆续出版》，《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》，1991年5月总第243期。
- 15 参见《〈安徽古籍丛书〉校点注释通则》，安徽省古籍整理出版办公室编制《〈安徽古籍丛书〉文件汇编》，2010年内部印行本。
- 16 参见《〈安徽古籍丛书〉校点注释通则》，安徽省古籍整理出版办公室编制《〈安徽古籍丛书〉文件汇编》，2010年内部印行本。